

中华

星辰谱

——
人生的冷暖

之魂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华之魂

星辰谱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之魂》星辰谱——人生的冷暖/《中华之魂》编委会编,翟明战执行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09
ISBN 978-7-80198-460-9

I. 人...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768 号

《中华之魂》星辰谱

Zhonghua Zhi Hun Xingchen Pu

主 编:《中华之魂》编委会编,翟明战执行主编

封面题字:李铁映

责任编辑:马 岳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cnipr.com>

电 话:(010)82000860 转 8325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1460 千字

ISBN 978-7-80198-460-9/K·003(10178)

邮 编:100088

电子信箱:mayue@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325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78

印 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0 元(共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华之魂》编委会名单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华初	左太北	叶正大	叶选平
师秋朗	朱 敏	伍绍祖	任远志
刘力贞	刘太行	刘丛军	刘彤矢
刘忠德	刘爱琴	刘朝兰	刘燕平
苏河清	李 敏	李特特	李铁映
陈昊苏	陈祖涛	邹家华	林用三
林汉雄	罗 箭	罗东进	周秉德
欧阳代娜	赵施格	胡木英	贺光辉
贺捷生	聂 力	郭志成	徐文伯
陶斯亮	黄 克	黄 健	萧永定
崔 军	康 冷	舒 炜	彭士禄
谢绍明	董良翠	曾宪林	鲍克明
蔡 妮	瞿独伊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邢立统	刘克府	刘忠铁	李 立
范红延	瞿明战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新如	艾 政	邢立统	刘克府
刘忠铁	江世雄	李 立	李丽丽
杨 丽	张法通	张晓岚	张景新
张燕林	易仁江	欧阳宁生	侯永雪
萧 铁	瞿和平	瞿明战	

执行主编 瞿明战

1	一代贤愚史册留
6	碧血染青史的——陈延年、陈乔年
20	子承父业的——李葆华、李星华
33	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
50	丹心照汗青的——刘允斌
64	帅府平民女——朱敏
74	“光明在前”的——任远志
81	从自然科学之路步入仕途的——叶选平
92	平凡的有心人——苏河清
99	在父辈熏陶中的——邹家华、叶楚梅
103	新中国第一个俄语播音员——瞿独伊
106	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彭士禄
117	延安时代的青年楷模——谢绍明
123	水电专家——罗西北
128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尖兵——叶正大
132	民革主席——李沛瑶
139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144	劳动模范——刘虎生
146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陈祖涛
151	自强不息的——伍绍祖
165	默默奉献的——李特特
170	水电将军——贺毅
178	誉满江河的陕北娃——崔军
182	为祖国争得殊荣的——黄健
189	走出多灾多难岁月的——郭志成
197	民歌旗手——刘燕平
206	心中只有祖国的——赵施格
211	至死不屈的——孙维世
219	监狱之星——张燕林
226	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任湘
229	机床工艺革新能手——张代侠
233	不向病魔让寸分的——刘彤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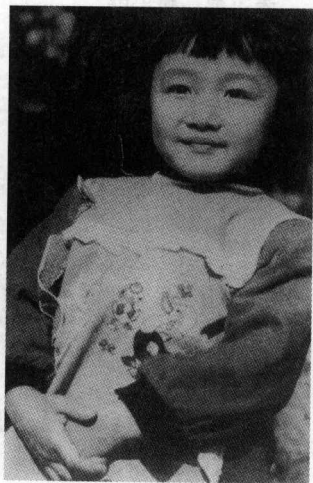
一代贤愚史册留

这代人有幸跨过 21 世纪的门槛，不能不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里程。这是前世没有、后世也不会再有的一代。

这代人的父辈，大多数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都是来自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中华民族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有些人虽然被历史推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职位上，但仍然是与中国百姓互为依存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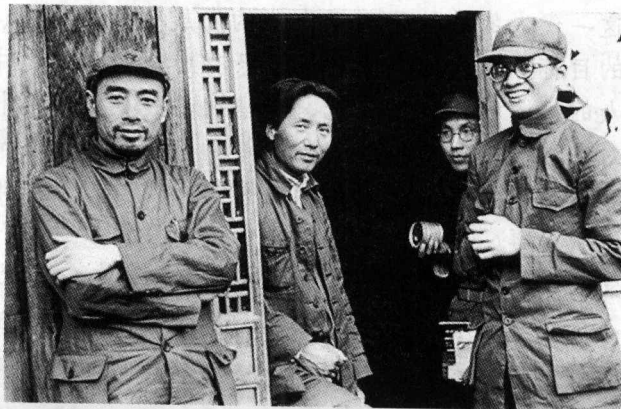
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说到底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子女。所以，这代人的成功和失败，虽与父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于社会，在于人民。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在父亲身边求学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远离父亲到法国勤工俭学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回到祖国后，便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孩子眼观父辈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父亲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学习自然科学，但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毅然参加了苏联红军，投入了反对



◆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



◆延安五老自左至右：朱德、董必武、林伯渠、
吴玉章，谢觉哉



◆天安门上毛泽东、刘伯承、陈毅

德国法西斯的殊死战斗……所以说，对任何个人的看法和评价，都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要以偏概全。对事是这样，对人也应该是这样。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

不管这代人处于怎样的境地，但始终都改变不了他们共有的心灵底色。这代人的群体意识特别鲜明和突出，思想行为规范更多地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准则：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左右着他们为人处事的动机与想法。按照毛泽东思想塑造出来的这一代，曾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代，也是帝国主义

最为害怕的一代。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逼下，这代人已有落伍之感！但他们终生无怨无悔，而且特别珍惜过去受过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既对这一代人生进行了导向，又使这一代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祖国至上、民族至上，是这代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个人的力量和奉献只有融合到群体之中，才能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个人的性命和家庭的安危，与事业、民族是不能相比的。这一代人大数，对自己一生中的追求孜孜不倦，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以平静的心态，坚持初衷的热情，生活在由自己选择的环境里，世风难以撼动他们坚若磐石的意志。民族自尊心和富民强国的责任感，贯穿了这一代人生全过程。虽然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所受教育在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却始终难以磨灭。尽管这种教育有不少缺憾，尽管对那个红色岁月可以持隐忍的批评态度，但其社会道德的优秀文明部分，依然值得留恋。因为任何制度下的社会民主，都不会拒绝良好的社会道德。



承上启下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万物衍生的纽带。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延安精神，该留下的将会被保存、被记取和继承。继承，虽不意味着拘泥不化，但核心和实质是万古不变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但从来不拒绝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就是为了向“洋人”学习；中国共产党派很多优秀分子去苏联留学，也是为了向“洋人”学习。马克思、列宁都是“洋人”，马列主义也是“洋货”。我们学习“洋人”，接受“洋货”，是有分析、有鉴别地学习，而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更不是跟在“洋人”屁股后边爬行。即使是马列主义，王明式的教条主义早已证明，完全照搬、“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这是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呵！

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走向世界，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改进我们的落后面，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这不是崇洋媚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高声呼喊过：“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呼喊不但要求后人重复，而且自己也要理性地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有些年轻人竟狂热地不加分析地崇拜外国的一切，一直到今日这种情况并未有根本的改观。出国“热”成了一种时尚，中华民族的后代，现在轻贱自己祖国的人为数也不少。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我们国家底子薄，物质还不够丰富。日本、美国以大大低于本国正常的社会价值，就可以让我国人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智力，滞留在这些国家为其所用，甚至尽情出卖祖国情报以换取美元。学习外语的目的，原本是为祖国服务。绝不能把会不会外语看成评价一个人的知识、文明开化程度甚至人格高低的标准。有些人以为，跨过外语听、说、写的门槛，就进入了外语世界的思想方式、价值体系、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和逻辑思维之中。固然，语言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忠诚的改造，也是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就会渐渐地和自己的祖国与民众相脱离，而自以为变成了西方世界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绝不能忘记，殖民制度的伤害，绝不只限于物质上的掠夺和社会的贫困化，也不只限于肉体上的压榨和奴役。殖民地体制对于人的人格、精神和灵魂的残害，有时历数代犹无以疗愈。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为了强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华战争中的忠诚，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展开的“皇民化”洗脑运动，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极度的民族自卑感，诱导民众透过自我改造成为日本的国民之一员，而求取与日本人“一体平等”，进行欺骗性同化运动。

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个民族也是一样。优点是人人都能列举并津津乐道的；惟有弱点、缺点，往往不易于为众人所正视和承认。中国人喜欢看热



闹，炒热点，不知道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

社会的热点，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不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经过媒体的宣传，就引不起全社会的共鸣，热点也会静悄悄地冷下来。

在当今的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追求离奇，道听途说，添枝加叶，把一些望风扑影的事大加渲染，以期调动某些人的胃口、迎合变态的心理。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还去搞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例如：谁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没有子女，前些年却跑出来一个《叫一声父亲太沉重》的女儿，在海外炒得天昏地黑！

大陆上的好事者也不甘寂寞，竟然包装了一个周恩来的儿子。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惟恐天下不乱！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贺子珍留在福建长汀的儿子毛岸红，因毛泽覃的牺牲而久查无下落。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都过世后，却有人写了几十万言的传记，大谈毛岸红一生的经历……

这些假人假事，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出现，之所以有人那么热衷于炒作，就是因为当今社会有人愿传、有人愿听、有人愿信！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怪台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曾有一段时间成了一些人研究、争论的焦点，成了一些好事者的热门话题。那些粗制滥造盗版的10多元港币的港版书，一度在北京黑市上卖到150元人民币。为什么有人愿出高价买这些谎言呢？无非是好奇心！因为正面的公开报道太少，小道的消息才会使人感兴趣。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人称共产党为“红党”，称红军为“红匪”。当时一提到“红”字，就能引起世人关注，“红”成了当时的社会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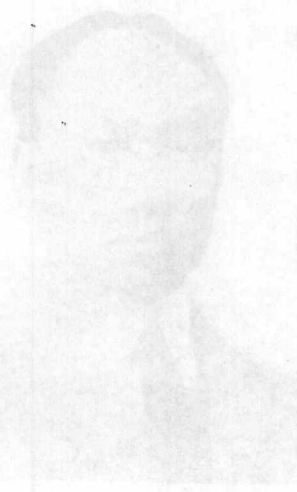
现代人写革命先驱者的事，取名为《红墙内外》；写革命老妈妈，取名为《红墙内的夫人们》；写先驱者的后代，取名为《红墙内的子女们》；还有什么“红色后代”、“红色公主”、“红色贵族”、“红摇篮”……这“红”字用在这里究竟是褒还是贬，没有人关心，只要能把“热”点“炒”起来，就达到了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炒作”的动力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金钱。“炒”和“钞”是孪生兄弟，“炒”是为了“钞”，“炒”的背后有一个商业利益在起作用。对于一部革命的文学作品或传记文学，它本来是一种精神产品，但跨上图书这种载体，投放到市场上去进行出售，就变成了商品。人们就把原本不需要“炒作”的真人真事，改头换面包装起来投放到市场上。

事情就是这么怪！同样一个事实，你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贬低，客观公正地报道出来，人家就不愿看。不管作品本身的价值如何，也不管作品的社会效益如何，买的人少，经济效益就差，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炒作”已是当今文化生活中的现实：“少金”就少



“钞票”，“少火”就少“热点”，热不起来就要“炒”，“炒”起来才有“钞”！这大概就是生意人的辩证法。

如果，有些人确实对这代人感兴趣，想了解，那我们也来个“火上加油”，增添一些“炒作”的原料，索性众人一齐“炒”，“炒”得冒烟着火，“炒”掉包装，炒出本相，让真假、美丑、善恶、良莠都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世人去评说吧！





碧血染青史的——陈延年、陈乔年

1927年7月4日，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乌云笼罩着戒备森严的大地。一辆囚车像幽灵一样开到这里，刽子手们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两眼闪着坚毅目光的青年。监斩官急忙验明身份后，大吼一声：“行斩！”

年轻人昂首面对屠刀，横眉冷视刽子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们心慌意乱，忙将青年人强行按倒，就在大刀将要落下的一瞬间，那五花大绑的年轻人，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们纷纷举刀乱砍乱劈，转眼间，这位英武神勇的青年便被乱刀分尸，躺卧在血泊之中。

1928年6月6日，一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斥问监斩官：“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应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卖国贼！”

监斩官无言以对，急忙下令“开枪”。在一排枪声中，这位英俊漂亮、气度不凡的美男子饮弹倒下，壮烈牺牲……



◆陈独秀

为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杀身成仁的两位青年，前者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后者是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延年牺牲时年方29岁，乔年就义时只有26岁。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被开除出党，继而成了中国“托派”的首领。再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提前释放，辗转入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出身豪门，早年曾中秀才。1898年，也就是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他的元配夫人高大众（晓岚）生下一个男孩儿，皮肤黝黑，虎头虎

脑，取名“延年”。

1902年，陈延年4岁时，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皙、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弟弟，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这一黝黑一白皙、一壮实一俊美的俩兄弟，生活、玩耍、学习始终在一起。两人虽然是同父同母所生，但外貌各异，性格也差别甚远。

哥哥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行事稳重而倔强，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皮肤白细，一表人才，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招人喜欢，像个“白面书生”。邻里、亲友们见兄弟俩形影不离，都说陈家风水好，祖上积了德。生了这么一对“文武双全”的神童，将来必成大器。

兄弟俩虽然性格各异，但从不打架吵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他俩生长在封建官僚家庭里，从小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受着封建礼教的熏陶，但毕竟是曾在乡下住过，接触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生活。

1913年，延年15岁、乔年11岁时，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父亲被迫二次东逃日本。

陈独秀长年远离家门，又很少关心儿子的生活和成长，延年、乔年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陈独秀东逃日本后，袁世凯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斩草除根。在敌人搜查前，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兄弟俩互作人梯，越墙逃到乡下老家，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在一起时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他俩在乡下，体验到了穷苦百姓劳动的艰辛，感受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第一次了解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的不平……

1915年的一天，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我国旅法著名女画家张玉良丈夫潘赞化，在上海法租界吉益里21号陈独秀的寓所，见到两个陌生的孩子，忙问陈独秀：“这两位是谁家的公子？”

陈独秀说：“他们都是鄙人的伢子。大的叫延年，小的叫乔年，从安庆领来上海读书的。”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将延年、乔年从乡下领到上海读书，为的是让他们兄弟俩能早日自创人生。

然而，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在对儿子教育上有他独特的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让他们独立生活。

亚东图书馆为徽州商人汪孟邹先生所经营，他是陈独秀同乡好友。延年、乔年俩兄弟寄居这里后，汪孟邹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兄弟俩10元生活费。他们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入震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兄弟俩曾在乡下生活过，看到过穷人的疾苦，对眼前的清贫生活不但能忍



受，还能以苦为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夹衣四季不离身；面黄肌瘦，身体消瘦，两人都已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不安。这位继母是延年、乔年的亲姨妈，姨妈视兄弟俩为己出，于情于理都应让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陈独秀何以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为此发生口角。于是，高君曼只好找同住上海渔阳里的潘赞化，求说：“望你以老友的身份代表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都会好受些。”说着竟泣不成声。

潘赞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总不以为然，斥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姑息养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存有芥蒂，不理睬陈独秀“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采取平等式的关系。

1917年，陈独秀应蔡子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纸片，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血缘关系。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一次，延年、乔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面黄肌瘦，生活如此艰苦，不禁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别说在上海求学，就是出洋留学，家里也供养得起。”

此时的延年、乔年，在独立生活中已经确立了自治自立的思想。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延年诚恳地说：“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两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的所谓民主，在延年、乔年两个儿子看来，那不过是“父道尊严”



的翻版。他们觉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就要彻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首先在他们家里，在他们父子之间，就有一场“革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很热衷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提倡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契约”。他们集中力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独裁。

由于延年、乔年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又不满父亲的教育方法，在自主独立生活中又经受了贫穷之苦，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他们的头脑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日益增多。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起来反对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胡适。他是陈独秀的朋友，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为了批驳胡适的荒谬观点，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和某些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有着一定影响。对于这场论战，陈独秀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在我和儿子之间就是如此。”

1919年底，延年、乔年两兄弟毅然离开了父亲，离开了祖国，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俩是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延年、乔年到法国之初，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入巴黎大学附属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文学、地理、法国文明史等，打算学完后报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延年、乔年和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得不到资助，过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陈延年兄弟俩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拼命地干活，一天辛苦劳动所得无几，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孩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除了阅读无政府主义书刊外，在上海上学期间，还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进化》杂志和其他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他们虽是陈独秀的亲生子女，但并没有接受父亲的“主义”，因此，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赏识。兄弟俩正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

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因而，从1920年下半年起，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们以很大的启发。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延年、乔年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这使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十分恼火，悔不该当初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赴法勤工俭学，并骂道：“这两个小狗崽子，比他们的老子还厉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任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教育厅厅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俩因公务不能脱身，没有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



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当选为少共中央执委、宣传部长，主编机关刊物《少年》。同年8月，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乔年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也加入法国共产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以及《向导》周报的许多文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深得在法国的延年、乔年的拥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和父亲一步步靠近了。父亲是党的总书记，党的正确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威信，也提高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共中央，引起总书记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老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儿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没想到，他们在法国短短两年勤工俭学，



◆陈延年

思想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想到此，陈独秀内心不由得感到几分欣慰，这真是“殊途同归”呀！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从苏联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

延年身着粗布中国衫裤，足穿方头布鞋，头发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留学